

# 从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角度谈谈科研管理机制的改革

马荣江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课题:《海南苗族史料研究》海南省社科联项目, HNSK (YB) 18-107

**【摘要】**文章主要通过社会学的客观描述的方式,勾画了我国当前科研管理体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科研管理中被颠倒了的管理者与科研工作者的关系;权力造成的科研管理者的异化;科研管理中所谓的贪污现象。并在结尾部分提出改革的基本依据。

**【关键词】**科研管理;改革;社会学

无需讳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层面上,越来越重视科研工作,对科研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并且不断地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要求提供较为宽松的科研环境,解放束缚研究者手脚的“绳索”,这些都是支持我国近几十年科研工作迅猛发展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不过,反观当前的科研工作者,报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这期间自然有人性的原因使然,但也说明我们目前的科研管理工作仍然有许多不足需要改革。

国务院〔2018〕25号文《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开宗明义说明行文的宗旨: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的改革要求;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但是,怎样建立这样的机制或者说科研领域怎样进行机制体制改革?文件只是只给出也只能给出一些纲领性的要求,虽然笔者很是期待,但也非常担心,因为文件的出去也再次说明了当前科研管理方面积弊甚深。那么,当前科研管理机制的弊有哪些呢?笔者不是管理学专业,也不太懂管理学理论,今仅从一个人文学科学研究者的角度,用社会学描述的方法谈谈当前科研管理的问题并希望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 1. 谁是科研活动中的“主人”

李克强总理2018年12月6日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科研管理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要尊重其自身规律,核心是要以科研人员为本。”国家近年来确实下发了很多文件,希望能够给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在落实的过程中,不是不到位,而是许多“放权”变成了“收权”。查看很多关于科研管理的文章,绝大多数学者从管理者的角度提出诸如“健全管理机构”“明确管理职责”“加强成果管理”“提高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数字化”等等<sup>[1]</sup>。但是论述大多忽视了科研管理产生的原因。

作为一种创新性活动,本来是可以不要“管理”的,比如,以前的蔡伦的蔡侯纸,毕昇的活字印刷,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黄道婆的织锦术,都不是科研管理管理出来的产生,而更多地来自于生活的需要和科学工作者的好奇心。马克斯·佩鲁茨认为,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会扼杀科研创新<sup>[2]</sup>,因为科学研究需要的是自主的或自发的进行,而不是预设了既定的目标,比如在飞机产生之前我们不可能告诉某个科学家你去研究一架飞机吧,人们总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发现了一点一滴地特点,然后再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积累多了,一种新的事物也就诞生了,这就是科研,它更多地发生在一次次的偶然发现之后,而不是产生于别人给你的预设的目标中。之所以产生“科研管理”,首先是因为科研成果的供应失衡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但是,现在的科研活动大都具有趋利性。比如,企业组织科研的目的是使自己的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可以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科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科研获得更多的报酬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种趋利性既给科研带来了动力,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科

研工作者,而一些少利或无利的科研必将门庭冷落,比如,一些基础威客、理论研究、资料的搜集或整理,而这些研究往往又是进一步科研的基础。因此,需要通过管理或政府提供一些利益来弥补不足。

科研需要管理的第二个原因是资金不足的。我们检索会发现,早期的科学家大多本国或当时的巨富,比如罗伯特·波义耳、牛顿、德布罗意等等许多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庄园或工厂,即使比如贫穷的也大多有富人支助,如马克思,这些科学家自己不为生计发愁,在自己的庄园里一待不是数年根据自己的兴起从事科研研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研中需要的大量的实验设备、仪器越来越昂贵,需要的一些资料非国家之力难以获取,而离开这些仪器实验就无法进行,离开这些资料科研就要停止,因此,需要国家或政府或企业参与进来。从这个意义上,参与进来的科研管理者应该是科研工作的协助者、服务者,科研工作者需要仪器、实验设备都交由他们购买,科研工作者的生计问题由他们提供保障。另外,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也需要大量的资金。一种新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走向社会,决不是科学家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社会活动,这个过程中,批量制造需要资金,宣传推广也需要大量的广告费用。

科研需要管理的第三个原因是科学活动的建制化、职业化。科学活动最初纯属个人爱好,科学家进行科研活动类似于中国农民,各人有一亩三分地,有人种菜有人种豆,是一种“小农式”科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大量的科研院所、科研机构建立了起来,科研工作者进入其中,与其说是对专业的喜欢与爱好,不如说是生活和职业。他们本质上已经类似于工厂中的工人,有自己的工作平台。与工人不同的是,工人造灯、造轮都是设计好的,而科学工作者造的东西仅存在于自己的大脑之中,究竟能否成形还需要自己的实验。众多的科学工作者,如果没人管理就会乱成一团,就会有太多的重复劳动,因此,必须有人管理协调,以进行分工协作,共享科研数据。

可见,科研管理应该产生的效果第一应该是给科研工作者提供资金或报酬;第二是促进科研活动均衡发展的;第三帮助科研工作者将研究的成果推广出去。而整个科研活动中,科研管理是为科研工作者服务的,科研活动的“主人”是科研工作者。

## 2. 科研管理的异化

从构成上看,科研管理无非包括科研组织体系和科研管理制度两个部分。科研管理的实施者就是科研组织体系,在我国,科研管理体系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按其功能可以分为行政决策机构、科学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sup>[3]</sup>,我们通常说的科研管理其实就是指行政决策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内部的行政部门,他们管理的对象则是科学研究机构,如大学、实验室和科研院所等,中介服务机构是指的科学技术的推广、咨询、服务机构,是科研管理体系的延伸。本文所说的科研管理的异化就是指这三

个方面的“异化”。

第一是管理人员的官僚化。前些年曾经流行过两本批判学者和学术的书，一本叫《丑陋的学术人》，作者是东方善鲁，另一本叫《风雅颂》，作者是闫连科，两本书都曾引起过轰动，尤其是前者，曾被称为“最早的、最全面的暴露学术界的腐败”之作，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暴露大多流于表面。权力的异化是这些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自上而下的科研管理过程中，居于结构上层的人员掌握着科研的“大权”，课题的立项、监督、结项等大量行政因素渗入其中，在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人员不一定或一定不是专业人员，于是常常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即着重考虑便利、效率等因素，而非学术或科学因素，尤其是科研与职称、利益相纠缠的时候，科研人员也就必然服从于权力，而这些管理者不再是管理者，而是衙门中的老爷，他们拥有着对科研工作者生杀予夺的大权。而科研管理人员的异化正是造成学术腐败最为重要的因素，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员不断地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寻租”，破坏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

第二是“学术老板”的诞生。与行政管理人员异化相关的是科研人员本身的异化。由于行政权力在科研工作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一切以效率或数量为尺度来评价科研工作也就成了必然的选项，违背科研规律，采取运动的方式进行课题攻关，频繁地对科研人员进行各种考核，重视课题的申报而轻视已经申报课题的研究，形成很多烂尾工程，重视成果的形式和数量，而轻视成果的实际效益和学术水平，造成很多重复研究或大部头却没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双肩挑”的既是科研人员又是行政管理人员，比如一些校长、院长或所长等，明明根本没有进行地任何科研工作，但是拿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本单位最多的。他们可以集全校、全院或全系之力为其一人服务，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只不过是“学术老板”。大高校中，大的学术老板下辖许多青年教师为其服务，小的学术老板将博士、硕士当成打工仔。争学科带头人争博导、争院长、争校长、其实就是争更大的老板。老板越大攫取科研经费的手段和途径也就越多，学术的异化也就越厉害。

学术的异化不仅仅是对公平、公正的破坏，更是对高校道德的破坏。这些掌控学术权力的人往往还会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制定各种“制度”或“规范”进行自我保护，这些“制度”或“规范”仅仅是制约普通科研人员的枷锁，对拥有行政或学术权力的人没有任何约束或即使有约束也难以起到作用，学术道德进一步沦陷，学术腐败横行。

第三是中介服务机构的“奸商化”。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介机构在科研管理中并没有占据太重要的地位，因为，那个时期学术或科研评价主要是采用同行评价，即主要由同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评价对象直接判断其研究成果的价值。但是，这种评价的公正合理与否与评价者的学识、道德关系极大，比如，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即便是同一学科，也不可能都精通，再加上一些人虽然学问做得还可以，但道德上却难以担当公正公平的评价人，于是，这一评价方式在世纪之交被人诟病。开始由行政主管部门或科研管理机构牵头，而评价的标准开始使用量化标准。比如，质量评价采用检索工具，理工科的科研质量常常采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和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文科常常采用CSSCI（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和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等，数量上按多少来评判。正是这些评价机制的原因，让进入这些索引的刊物版面费水涨船高、坐地起价。同时，这些刊物的编辑和主编也都从中找到谋利的渠道。另一种重要的中介服务机构出版社也被分成三六九等，最初分为国家级、省级出版社，最后发现这样的分级还不能满足人权力分层的需要，又在国家级出版社这一层次中分为：权威国家级和普通国家级。高层级的出版社也与学报一样出版费高出出奇。同时，一篇论文拆成三四篇，出版物、学术著作不断低水平复生出版。

### 3. 科研管理中的“贪污”

科研管理中也有些贪污现象，比如私分或套取科研经费，再比如《求索》杂志主编通过杂志为自己谋取过亿的利益，这是国法

所不许，也被广大学者所唾弃。但也有另一种“贪污”者，即便是法院已经做出裁判，但人们对“贪污犯”仍然报有更多的同情。我们先看几则科研人员贪污案：

2016年，济南天桥区法院对山东大学教授陈哲宇贪污案宣判，判处陈哲宇有期徒刑四年；2017年，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涉嫌贪污案一宣判，褚健获刑三年零三个月；2017年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对清华大学教授付林提起公诉，最初起诉书显示，付林涉案总金额可达亿元级别。这些都曾经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付林案，由于舆论的影响，通常为3个月的审理期限被一再延长，2018年2月14日经海淀人民法院批准付林被取保候审，2018年9月20日海淀区检察院决定对付林撤回起诉，这意味着，最终以付林是清白的而告终。褚健案，落马时800余人签名作保，出狱时，自媒体以《浙大副校长贪污1亿3千万，坐了4年牢，可最近，国家居然又给了他2758万，这个案件离奇到你难以想象》为题纷纷转发。

那么，为什么此类案件即便法槌已经落下，社会的质疑声仍然喧嚣不止？主要因为，我们科研财务管理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我们知道，科研经费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科研消耗和科研报酬，按道理来说，科研报酬是最终科研成果的形成应有的报酬，是对科研工作者劳动应该付出的报酬，也就是说没办法提供发票的，科研消耗一部分是科研耗材，通过正规的商家购买，可以提供发票，而有些材料根本找不到给你提供发票之人，比如，宋敬敏教授研究海南铜锣，于是，从民间搜集了好多面铜锣，这种购物发票从哪里能出？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进行资料的搜集和分析，而这一部分主要是田野调查、查阅、思考和排比，发票从何而来？于是，“买发票”成了人文社科科研经费报销的唯一方法。如果对照法律查办，可以把所有的人文社科类专家抓起来，无一例外。财务监管最常用的监管方法是拿你申报课题时的预算进行核报，但是既然是科研就不可能跟原来的设想重合，甚至可以说如果完全重合根本就不是科研，这种不确定性是科研区别于政府或企业事务的关键。随着科研的推进，预定方案和路线一定会发生变化，同时，耗材和设备的采购也会随之而变，如果研究按照原来的预算核报，必然会有些费用无法下账。再加上科研经费下拨往往涉后，而按照有些机构的规定，比如海南某大学，所有报销经费必须在花费45天内完成，更是有好多垫资的账目没法报销，而科研人员为了科研的顺利进行必然进行“不当套取”，于是“贪污”的帽子从一开始就等着科研人员。

从国家层面来看也是如此，国家有关部门之所以通过项目审查并下拨科研经费，主要是国家看中了科研的效果，科研经费中本来就应该有科研人员的“智力投入”，因此才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目的就是给科研人员解绑+激励。但事实上，各个部分为了监管方便，财务监管中仍然按照公务机构的监管方法，忽略“智力”和“创新”这个最为关键的部分。

综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不忘初心。不忘科研管理的初心，让管理者回归到服务者、协助者这样一个最初身份，给科研工作者更多地尊重和自由，而不是官老爷，高高在上，对科研工作者指手画脚。回到组织协调的初心，平衡应用型研究和基础研究，平衡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发展，促进社会的自由、民主、法治进程的稳步推进。当然，“不忘初心”并非是不管科研管理，作为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科研已经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的发展目标，而且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国家对科学研究的调控与干预也成了一种趋势，而干预必将影响到科研的独立与自主，因此，科研管理实现“不忘初心”的关键是：“度”，也就是说，科研管理决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要适应科学研究的特点，要有一定的弹性，或者要有一个比较宽泛环境。